

愛爾蘭的文化意象與主體意識

——兼論愛爾蘭文化·產業

范盛保

崑山科技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系助理教授

前言

自 1172 年英王亨利二世(Henry II Curmantle, 1133-1189)渡海征服愛爾蘭島，置愛爾蘭島於英格蘭統治，至 1921 年英國承認愛爾蘭 26 郡為獨立自由邦止，愛爾蘭這個處在英格蘭/英國殖民暴政的陰影下近 800 年的國家，產出許多舉世聞名的文化意象，讓世人將之與愛爾蘭連結。這些文化意象包括了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 Dublin University)、哲學家柏克(Edmund Burke, 1729 —1797)、劇作家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 1854-1900)以及喬治·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詩人威廉·巴特勒·葉慈(William Butler Yeats, 1865-1939)、當代小說家詹姆斯·奧古斯丁·阿洛伊修斯·喬伊斯(James Augustine Aloysius Joyce, 1882-1941)，甚至首都都柏林等，都是愛爾蘭文化的瑰寶，而這些文化意象在建構愛爾蘭主體意識的過程中扮演一定角色。

愛爾蘭的文化不只是愛爾蘭人歷史的共同記憶，也是愛爾蘭文化·產業的根源。本文除了探討愛爾蘭的文化意象與主體意識外，也同時分析愛爾蘭藉由這些文化瑰寶發展成文化·產業。必須說明的是，本文並無意析論愛爾蘭所有的文化意象。

愛爾蘭的歷史進程

傳統上，愛爾蘭被劃分為四部份，康諾特(Connacht)、倫斯特(Leinster)、明斯特(Munster) 以及歐斯特(Ulster)。時間回到 1169 年，被逐出的倫斯特國王 (King of Leinster) 馬克穆羅夫 (Dermot MacMurrough, 1110-1171) 求助亨利二世 (Henry II) 引英軍來助其重新奪回統治權，馬克穆羅夫報之以效忠歸順英格蘭，並將女兒嫁給入侵倫斯特有功之英格蘭貴族理查·德·克雷 (Richard de Clare, 1130-1176)。馬克穆羅夫雖然一時恢復了整個倫斯特王國，但這是引狼入室，首府都柏林(Dublin)從此成為英格蘭在愛爾蘭的勢力中心。擔心理查·德·克雷勢力坐大的亨利二世於 1171 年發動第二次入侵，迫使愛爾蘭諸王紛紛稱臣效忠。往後數百年一直到 1541 年，英格蘭國王雖被稱為愛爾蘭的領主(Lord of Ireland)，但主要的影響力仍在都柏林附近以及其他各區的重要城鎮(王振華、陳志瑞、李靖堃編，2007：33-34)。

英格蘭在宗教改革開始後，為了防止教皇利用愛爾蘭向英格蘭發起攻擊，防止教皇攫取愛爾蘭的王冠，1542 年以新教徒為多數的愛爾蘭議會(Parliament of Ireland)通過愛爾蘭王權法案(Crown of Ireland Act 1542，全名是 An Act that the King of England, his Heirs and Successors, be Kings of Ireland) 宣佈英格蘭國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 1491-1547)及其繼承者同時為愛爾蘭國王，自此至 1800 年，英格蘭國王在愛爾蘭的頭銜從「愛爾蘭的領主」變成「愛爾蘭的國王」。

1603 年英格蘭與蘇格蘭簽訂了「王權聯合」(Union of the Crowns)，共擁英格蘭國王為共主。1707 年英格蘭與蘇格蘭簽訂了「1707 年聯合法案」(Acts of Union 1707)，廢止了英格蘭王國與蘇格蘭王國，取而代之的是大不列顛聯合王國。到了 1800-01 年，大不列顛聯合王國國會通過了「愛爾蘭聯合法案」(Union with Ireland Act)，愛爾蘭國會則通過了「聯合法案」(Act of Union)，從此大不列顛聯合王國與愛爾蘭王國合併在一起，成為大不列顛與愛爾蘭聯合王國，一直到 1922 年愛爾蘭 26 個郡組成愛爾蘭自由邦(自治領，猶如 1901 年獨立前的澳洲，

或是 1907 年獨立前的紐西蘭)，脫離了聯合王國，享有自治權，剩下北愛爾蘭 6 個郡(至 1974 年改為 26 個自治區)仍屬聯合王國的管轄範圍。

從 1171 年的亨利二世，代表著英格蘭勢力進入愛爾蘭之濫觴，到 1922 年愛爾蘭自由邦脫離了聯合王國，這近 800 年的愛爾蘭歷史，就是一部英格蘭/英國殖民的暴政史。甚至一直到上世紀 90 年代以前，愛爾蘭被經濟學人雜誌稱為「經濟的失敗者」，高失業率、高通貨膨脹率、低經濟成長率以及高賦稅、鉅額外債等現象，被該雜誌於 1988 年喻為「富裕國家中最窮者」(The poorest of the rich)。90 年代末期，經濟學人的封面故事卻訴說著愛爾蘭成功的故事，並以「歐洲閃亮之光」(Europe's shining light)稱許其經濟成長 (*The Economist*, 2004/10/14)。

幾世紀以來，愛爾蘭人面對殖民創傷卻又無力反擊，精神上雖以凱爾特(Celtic)民族自豪，但政治及宗教上倍受打壓，心靈上產生高度的不安全感。不喜歡英語，卻又遺忘了自己的凱爾特(Celtic)母語(高維泓，2007)。雖然因英格蘭的殖民統治，造成愛爾蘭人民的母語流失，歷史延續橫斷，文化印記模糊，國家主體意識淪喪，最終落得只能在自己的土地上流浪。但莊坤良(2007)認為，這種慘痛的經驗，並沒有叫愛爾蘭人屈服，反而激發了一波又一波的反殖民起義運動。而文人在對抗殖民政權，追求政治獨立的過程裡，並沒有缺席。愛爾蘭的文人作家，以文字書寫，啓迪民眾思想，進行無聲的心靈改革，並以藝術家的靈視與洞見，想像、建構、發明未來的愛爾蘭國家，這種在特殊的時空背景產出的文學，更能反映出當時的社會情境。

意象·文化意象·愛爾蘭文化意象

關於意象，韋伯辭典將之定義為：眾人普遍接受認定的一種精神概念，並且是對某些事物之基本樣式及定位之象徵 (A mental conception held in common by member of a group and symbolic of a basic attitude and orientation toward something)。用最簡單的說法，即是「意中之象」，亦即「人們在心中產生想像的

圖象，透過語言、文字或各種藝術等方式的表現」。而所謂文化，泛指一個社群的生活模式。文化意象或可界定為「對於某社群的意中之象」。

提到愛爾蘭的「意中之象」，除了上述劇作家、文學家、詩詞家，亦有建築物如三一學院或都柏林市，踢躑舞、知名電影、歌手等也是愛爾蘭的「意中之象」。但本論文所討論的愛爾蘭文化意象，以其歷史進程中影響愛爾蘭主體意識的人或物為主，包括了三一學院及其孕育之哲學家柏克(Edmund Burke, 1729—1797)、革命家提奧巴爾德·沃爾夫·托恩(Theobald Wolfe Tone, 1763—1798)，以及詩人威廉·巴特勒·葉慈(William Butler Yeats, 1865-1939)、當代小說家詹姆斯·奧古斯丁·阿洛伊修斯·喬伊斯(James Augustine Aloysius Joyce, 1882-1941)。

都柏林大學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 Dublin University)

湯馬斯·佛里曼(Thomas L. Friedman)在其著作《世界是平的：一部二十一世紀簡史》(The World Is Fla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分析了21世紀初期全球化的過程。世界已經進入全球化的階段。他摘要地敘述全球化的歷史：由1492年至1800年是「全球化1.0」，力量來自國家。由1800年至2000年是「全球化2.0」，力量來自跨國企業，並且分為兩階段，前半段來自「運輸成本下降」，後半段來自「通訊成本下降」。從2000年起，進入「全球化3.0」，力量來自個人。「世界正被抹平」產生了最重要的可能是工作的被替換性增高。在這情形下，佛里曼認為政府對於教育的投資以及父母管教方式對孩童未來影響將更形重要(佛里曼：12-13)。21世紀的佛里曼認為教育對國家未來的發展非常重要，然而，這些體會早已在400年前的愛爾蘭中落實。

根據英國倫敦的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專刊(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 THES)對於全球大學於2007年的排名，愛爾蘭都柏林大學的三一學院排名第53名。再根據金融時報MBA排名(Financial Times MBA Ranking)，三一學院全球排名第70名。這座與英國劍橋、牛津大學，美國哈佛、耶魯大學齊名，享有悠久學術傳統的都柏林大學三一學院，由伊麗莎白女皇創於1592年，

當初的目的不是應付全球化的影響或是日不落國的初步形成，而是要「教育」愛爾蘭人，使其遠離天主教的影響(愛爾蘭：148)。三一學院的圖書館是英倫三島的四大版權圖書館(Copyrights Library)之一(其他三個是大英圖書館以及牛津、劍橋圖書館)。亦即按照「法定送存圖書館法」(Legal Deposit Libraries Act)規定，每一個出版社出版的合法刊物，該圖書館都可以免費收藏一本。也因此，三一學院每年有 10 萬冊新書，累計至今已有 450 萬冊的藏書(Wikipedia)。

三一學院的文化資產，除了建築以及它對中世紀手抄本凱爾之書(Book of Kells, 僧侶在抄寫福音傳教本時，以一種獨創的字體與彩繪圖飾創造出全世界最美麗的書之一)的保藏外，三一學院孕育了許多具影響力的人物。於法國大革命、大恐怖期間先後過世的伯克以及托恩對愛爾蘭主體意識影響兩極。

柏克(1729 -- 1797)與托恩(1763 – 1798)

經常被視為英、美保守主義的奠基者、18 世紀的哲學家柏克，反對英王喬治三世和英國政府，並支持美國殖民地以及後來的美國革命，但這些立場卻在法國大革命時被自己全然推翻。在柏克近 10 萬字的「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中，柏克成為英國最早而又最突出的法國大革命批判者，他認為大革命已經演變為一場顛覆傳統和正當權威的暴力叛亂，而非追求代議、憲法民主的改革運動，他不同意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 - 1778)關於「大眾意志」(popular will)的說法，反而認為大多數的人是不夠資格擔任統治者。柏克認為：「我們應該尋找受良好教育的人，並且是受良好天主教教育的人來擔任領袖。任何藉由大眾的力量來統治眾人之事者，最終將無可避免的使此國家之個人遠離卓越與榮譽，而漸走向毫無原則的平庸之才」。他甚至認為法國革命時的自由、平等、博愛的教條將不利於大眾，並且危及法國以往所尊榮的資產。

或許卡爾·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對伯克的批評太過嚴厲，當他寫道：

這個諂媚者(柏克)受了英國君王的賄賂，讓他批評法國大革命，就有如他在美國問題的開頭時被北美殖民者收買以讚美他們，這個假扮自由主義者對抗英國君王的傢伙，只是個徹底下流的資產階級。

The sycophant—who in the pay of the English oligarchy played the romantic laudator temporis cacti (praiser of time past) against the French Revolution just as, in the pay of the North American colonie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American troubles, he had played the liberal against the English oligarchy -- was an out-and-out vulgar bourgeois (Wikipedia).

但如果把托恩的遭遇考慮進去，站在愛爾蘭主體的立場，或許真能體會馬克斯對於伯克的批評。被 1840 年代「年輕愛爾蘭運動」(Young Ireland Movement) 奉為聖像的現代愛爾蘭獨立主義之父托恩，於 1791 年與湯瑪斯·盧梭(Thomas Russell, 1767-1803) 等人合組愛爾蘭人聯合會 (Society of the United Irishmen)，其目標是廢除一切的人為宗教差別，聯合全體愛爾蘭人民反對大不列顛的強橫勢力，為愛爾蘭人民在全國性議會中爭取真正的代表權。然而，來自法國革命所帶來的法國國王被送上斷頭台及大恐怖時期的情景，在大不列顛及愛爾蘭統治階級內部引起了恐慌，使統治者變的更保守甚至反動，關於政治、法律、宗教以及窮人的生活狀況等方面迫切須要進行的改革都被擱置或遭到抵制，通往政治改革的道路被堵住了(王振華、陳志瑞、李靖堃編，2007：47)。值此社會秩序大亂之際，英國於 1797 年 3 月 2 日頒布了戒嚴，以國家恐怖主義的模式，使用酷刑、燒房子、暗殺等殘酷手段對付愛爾蘭人。1798 年 5 月，愛爾蘭人聯合會起而反抗，與拿破崙有數面之緣的托恩，等不到法國援軍(後來到了 1,100 人)，大起義失敗了，法國援軍被視為光榮戰俘，愛爾蘭人則被屠殺，約 10,000 至 25,000 人被殺，相當高比例的被屠殺者是非戰鬥人員(Bartlett, *BBC British History*)。

身著法軍副官(Adjutant General)制服的托恩被擒為戰俘，要求法院判他死刑並槍決他，但被駁回。法院判他有罪，但以絞刑結案。在執刑前，他割喉自殺，得年 35 歲。托恩的自殺彷彿訴說著，英國沒有資格決定托恩的生命，只能擁有托恩的屍體，似曾相識的情景不也發生在鄭南榕的身上，當 1989 年鄭南榕收到「涉嫌叛亂」傳票。他公開宣佈「國民黨抓不到我的人，只能抓到我的屍體」，並於被拘捕前自焚。

Fintan O'Toole (1994) 在分析愛爾蘭的文化成就時，用「愛爾蘭的文化革命」為之讚許。他在文章中指出，當代英語小說界最重要的獎項—布克獎(The Booker Prize，1968 年創立，2002 年更名為曼氏布克獎 The Man Booker Prize)，將 1994 年的桂冠頒給愛爾蘭人羅迪·道爾(Roddy Doyle)、2005 以及 2007 的曼氏布克獎亦頒給愛爾蘭籍的約翰·班維爾(John Banville) 以及安妮·恩瑞特(Anne Enright)。在奧斯卡的獎項中亦常見到愛爾蘭人的蹤影，包括導演吉姆·薛瑞登(Jim Sheridan，編導以父之名，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尼爾·喬登(Neil Jordan，編導亂世浮生 The Crying Game、夜訪吸血鬼 Interview with the Vampire)等，以及演員如連恩·尼遜(Liam Neeson，主演辛德勒的名單 Schindler's List)、李察·哈里斯(Richard Harris，於神鬼戰士 Gladiator 中飾老皇帝奧里略)以及丹尼爾·戴·路易斯(Daniel Day-Lewis，主演純真年代 The Age of Innocence)等。對人口數遠低於紐約的愛爾蘭而言，這樣的文化成就已相當具有國際性影響力，堪稱是愛爾蘭的文化革命。

除了上述這些文化成就外，如果十八世紀以降的劇作家少了喬治·法科爾(George Farguhar)、奧利佛·葛史密(Oliver Goldsmith)、里查·布林斯里·謝雷登(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喬治·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辛約翰(John Millington Synge)、歐凱西(Sean O'Casey)以及山繆·貝克特(Samuel Beckett)等人的貢獻，英語劇場必將失色不少。同樣的，如果當代詩詞少了詩人威廉·巴特勒·葉慈(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或

是當代小說少了詹姆斯·奧古斯丁·阿洛伊修斯·喬伊斯(James Augustine Aloysius Joyce, 1882-1941), 當代的文學發展就不是如此豐富了 (Fintan O'Toole: 1994)。而後二者諾貝爾桂冠的文學作品更充分展現出其對愛爾蘭主體意識之觀察。

莊坤良(2007)在分析愛爾蘭的文人寫作與國族思考的二種模式, 認為以葉慈與喬伊斯最具代表性。他認為, 「如果以寫作來愛國的方式有兩種: 一種是美化與讚美自己的國家, 另一種則就事論事, 冷血批判它, 那麼葉慈就是第一種的代表。他走本土路線, 主張回到愛爾蘭的神話傳說與純樸的農村, 去發掘未受英格蘭文化污染、純正的凱爾特文化, 並以此為本, 重建愛爾蘭國家。而後者以喬伊斯為代表, 他選擇國際路線, 在海外以現代主義包裝作品, 以恨鐵不成鋼的心情, 針貶殖民情境下被扭曲的愛爾蘭文化認同」。

葉慈所表現的愛爾蘭主體意識

1923 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葉慈, 其獲獎的理由是「以其高度藝術化且洋溢著靈感的詩作表達了整個民族的靈魂」(inspired poetry, which in a highly artistic form gives expression to the spirit of a whole nation;)(Wikipedia)。葉慈早期的浪漫詩作茵湖島(The Lake Isle of Innisfree, 亦譯作湖島因尼斯夫莉)體現出他的心嚮往著愛爾蘭祖國。

此刻我將動身前去, 去那茵湖島

I will arise and go now, and go to Innisfree

.....

此刻我將動身前去, 因為日日夜夜

I will arise and go now, for always night and day

我聽到那湖水輕拍岸邊的低語

I hear the water lapping with low sounds by the shore

當我佇足在大道上，或在灰濛的小徑時

While I stand on the roadway, or on the pavements gray

我聽到那湖水在我心深處迴響不絕

I hear it in the deep heart's core (莊坤良，1988)

HasKell (2001)認為，當葉慈在寫此詩時，身處倫敦，思念愛爾蘭故鄉。更深一層思考，愛爾蘭語的“*Innis*”是「島」的意思。把 *Innisfree* 就是「自由之島」，就是愛爾蘭。想像葉慈站在倫敦街頭時，心中想的是愛爾蘭祖國的自由之路。祖國的呼喚，猶如湖水，一波接一波(莊坤良，2007)。

1916 年的復活節起義 (*Easter Rising*) 是愛爾蘭自托恩於 1798 年自殺身亡後，邁向愛爾蘭共和國的最重大的里程碑。復活節起義主要由愛爾蘭志願軍(*Irish Republicans*)發動，並由愛爾蘭共和兄弟會(*Irish Republican Brotherhood*)策劃。起義軍趁英國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際，認為「英格蘭的危機是愛爾蘭的機會」(*England's difficulty is Ireland's opportunity*)，突襲都柏林重要建築。然而因為裝備不足，寡不敵眾(1 比 20)，經過一週的巷戰後 3226 人被捕，起義軍只好投降。愛爾蘭人原本對此起義之瘋狂暴力行為感到厭惡，對於都柏林變成廢墟感到惋惜，卻因為英國政府不顧國際社會的籲請，執意將被捕的起義領袖多數處死(16 場行刑)。當這群人面對行刑隊的勇氣震攝了愛爾蘭人時，「復活節起義」變成了愛爾蘭民族主義的象徵，被處死的起義者也成了民族英雄(愛爾蘭：2007；王振華、陳志瑞、李靖堃編，2007：59)。

起義的首腦之一派屈克·亨利·皮爾斯 (*Patrick Henry Pearse*，1879-1916) 在給母親的遺書中寫著：

請別為我悲傷，我們已保存了愛爾蘭及自己的榮譽。現在人民
會對我們的起義說三道四，但後世子孫將永遠記得我們。

You must not grieve for all this. We have preserved Ireland's honour and our own. Our deeds of last week are the most splendid in Ireland's history. People will say hard things of us now, but we shall be remembered by posterity and blessed by unborn generations (Wikisource).

詹姆斯·康諾利(James Connolly 1868-1916)在臨刑前說：

我們為了切斷和英國的關係，以建立愛爾蘭共和國。……我們證實了愛爾蘭人準備好以死換取權利。……我感謝上帝我已看到那一天，當成千上萬的愛爾蘭男人與男孩，數以百計的愛爾蘭女人與女孩，準備好了去肯定此舉，在有必要時並以生命參與其中。

We want to break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is country and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o establish an Irish Republic.....We succeeded in proving that Irishmen are ready to die endeavoring to win for Ireland those national rights..... I personally thank God that I have lived to see the day when thousands of Irish men and boys, and hundreds of Irish women and girls, were ready to affirm that truth, and to attest it with their lives if need be.

此時的葉慈看到起義的戰火，卻不是十分贊同此舉。在他的「復活節 1916」(Easter 1916)的詩裡，他先批評起義份子約翰·馬克布萊(Major John MacBride, 1865-1916)，主要是因為馬克布萊對他的妻子茱德·岡(Maud Gonne, 1866-1953)不好，而茱德·岡正是葉慈生命中重要的女人之一，一個讓葉慈朝思暮想、神魂顛倒的女子。葉慈寫著：

這邊這個從前是我想像中

This other man I had dreamed

醉漢一個，狂妄愛誇口的混混

A drunken, vain-glorious lout.

竟敢對我心中縈繞的人做出極端傷害的錯事

He had done most bitter wrong To some who are near my heart,

然而我的詩還是要提到他

Yet I number him in the song;

一樣，他已經辭卸了

He, too, has resigned his part

在這即興的喜劇中

In the casual comedy;

一樣的，輪到他時他就變了

He, too, has been changed in his turn,

變化而無遺

Transformed utterly

可怖之美就要誕生

A Terrible beauty is born

對於其他的革命份子，包括馬克鐸拿(Macdonagh)、馬克布萊(MacBride)、康諾里(Connolly)以及皮爾斯(Pearse)，葉慈也在詩中敘及：

馬克鐸拿，馬克布萊

Macdonagh and MacBride

康諾里，皮爾斯

And Connolly and Pearse

此刻以及永久未來

Now and in time to be

每當那時穿著綠衣

Wherever green is worn

都變了，完全變了

Are changed, changed utterly

可怖之美就要誕生

A terrible beauty is born (楊牧編譯，2005)

復活節起義後，葉慈省思著多少人因國家之名，民族之愛而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革命的英雄行徑，夾雜著使命感與暴力，理想與悲劇，高貴與流血，美麗與恐怖，也因此，「都變了，完全變了，可怖之美就要誕生」，葉慈的心境轉而關心國內族裔之間的和平相處問題(莊坤良，2007)。與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有些許雷同之義，安德森強調的國族主義(Nationalism)緣起於「想像的行動」，或是「許多人的想像的行動」(Nationalism originated in an act of the imagination, or by the imaginative acts of many people)。葉慈強調的是「文化國族主義」(Cultural Nationalism)，或稱為凱爾特文藝復興(Celtic Revival)，所關心的是愛爾蘭人的文化認同。Allison (2001)認為，葉慈所認為的「文化國族主義」，是「想像的愛爾蘭」(imaginary Ireland)，是一種「自我意識」(self-consciously)而存在的愛爾蘭。

在愛爾蘭知名小說家艾德娜·歐伯蓮(Edna O'Brien)的筆下，詩人葉慈相信古代祖先的嬰靈是愛爾蘭賦予他的最好資產，並且是他內心詩詞創作的源頭活水。但對於喬伊斯而言，他所繼承到的資產，則是都柏林市美景區(Fairview)的

一作聖母瑪利亞石膏像，還有一旁爛菜傳來的陣陣臭酸味，以及和爛菜一樣腐化的靈魂(歐伯蓮，2003：41)。

喬伊斯作品下的愛爾蘭人

詹姆士·喬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所代表的愛爾蘭主體意識，是在海外以恨鐵不成鋼的心情，針貶殖民情境下被扭曲的愛爾蘭文化認同(莊坤良，2007)。被譽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小說家的喬伊斯，經過家道中落而被迫墜入幾乎是貧民窟的生活。他憤怒，或者說是氣炸了所處的都柏林，連三一學院都被他形容成「因為這個城市的愚昧無知而得依矗立在這裡」。他對愛爾蘭的感覺如同他對信仰與情感一樣，令他覺得暴躁與嘔心。喬伊斯一生大部分的時光都遠離愛爾蘭，他之所以離開這個國家，是不想沾染一大堆惡習，包括「粗暴鄙俗、心術不正、空空洞洞、只會憑空幻想、什麼事也不做、還有老是喋喋不休地談論著對於上帝與已逝者的情感」(歐伯蓮，2003：43)。從他 1914 年著作「都柏林人」(The Dubliners) 小說集之「會議室裡的長春藤日」(Ivy Day in the Committee Room，以下稱長春藤日)，更可以看出他對愛爾蘭、愛爾蘭人之恨鐵不成鋼的心境。

如前述近 800 年的英格蘭/英國殖民暴政史，對愛爾蘭的政治、經濟、社會、語言、文化等產生絕對的影響。英格蘭/英國透過殖民霸權的宰制，使愛爾蘭人普遍陷入一種喬伊斯所稱的「殖民麻痺」狀態，而都柏林則是「麻痺的中心」。阿圖舍(Louis Pierre Althusser 1918 – 1990)在論國家機器時指出，有兩種模式鞏固統治權，分別是強制性國家機器，包含了軍隊、警察、司法、及國家行政等方式所進行的宰制，以及意識型態的國家機器，意指國家透過宗教、信仰、文化、社會化之操弄來進行個人空間範疇的思想改造(莊坤良，2008：37)。

「長春藤日」展現出殖民者用各種國家機器以殖民者的霸權控制愛爾蘭，「長春藤日」更刻劃出被殖民者的麻木。喬伊斯對愛爾蘭民族主義份子抱著「愛恨交織」(ambivalence)的心情，一方面對民族主義份子秉持高度期盼，但另一方面也

對他們的麻痺、墮落感到痛心。他認為愛爾蘭民族主義在爭取愛爾蘭獨立自治的過程中，雖有路線之爭(議會路線或暴力抗爭)，嚴厲苛求自己族人、卻輕易原諒殖民者(同樣有婚外情，英王艾德華七世與議會路線的巴奈爾卻受雙重標準判斷)。背叛自己的族人事件頻頻發生，例如 1916 年復活節起義因族人背叛而失敗，對殖民者英王艾德華七世來訪竟表示歡迎之意。這些都是彰顯愛爾蘭人在殖民霸權的宰制下，常以西瓜位大邊的投機行爲，被英國殖民主收編，並引此爲豪的「被殖民麻痺心態」(莊坤良，2008：29-36)。

在喬伊斯的筆下，愛爾蘭的主體意識被收買了、被腐蝕了。同樣展現出喬伊斯眼中愛爾蘭人長期被殖民因而心靈麻痺的是其 1916 年的著作--「一位年輕藝術家的畫像」(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喬伊斯藉由主角青年史蒂芬來展現年輕的心靈僅能被現狀牽制而帶來心靈麻痺狀態。史蒂芬好友達文(Davin)主張要回復「愛爾蘭語」，標榜「愛爾蘭人說愛爾蘭語」、「國家至上、愛爾蘭至上」。當史蒂芬在多所思索與掙扎後，決定要切斷與國家、語言、宗教等網絡，重新尋找新的生活。此舉引發達文的不滿，並指控史蒂芬背叛國家與人民。達文對史蒂芬說：

我是最堅定的愛爾蘭民族主義派。……有回聽到你批評英國文學，而你現在卻批評自己人，批評愛爾蘭民族主義者。……你到底是不是愛爾蘭人啊？(I am an Irish nationalist, first and foremost.....One time I hear you talk against English literature. Now you talk against the Irish informers.....Are you Irish at all?)

史蒂芬回答說：

這個民族、這個國家與這樣的生活造就了我，我將用我這樣的狀態來表達我的思想與情感。……我們的祖先丟棄了自己原先

的語言而選擇了另一種語言，他們允許自己臣服於一群外人，你認為我應該必須用我一生的青春歲月來償還祖先遺留的債務嗎？為的是甚麼？(*This race and this country and this lie produced me. I shall express myself as I am.....My ancestor threw off their language and took another, they allowed a handful of foreigners to subject them. Do you fancy I am going to pay in my own life and person debts they made? What for?*)

這正是喬伊斯的風格，對殖民宗祖國英國與被殖民的愛爾蘭抱著同樣的睥睨態度(邵毓娟，2008：52-72)。當史蒂芬說：「我們的祖先丟棄了自己原先的語言而選擇了另一種語言，他們允許自己臣服於一群外人，你認為我應該必須用我一生的青春歲月來償還祖先遺留的債務嗎？」映射台灣，喬伊斯的文筆不也寫出台灣人長期被禁錮的心靈？當台灣人在文化上擁抱強勢文化的語言(包括文言文)，進而忘了自己的語言；當台灣人以麻木的心靈寄望經濟上依賴強勢帝國賞一口飯吃，如同愛爾蘭人覬覦英國人的憐憫與施捨；當台灣人在政治上茫然、墮落，麻痺於偉大民族卻忘了自己的國族，似乎，喬伊斯在嘲笑著這樣的台灣人。除了外在帝國類似殖民的欺壓，台灣人更可悲的是將曾經是殖民宗主的外來政黨，任由他消滅台灣主體性，甚至協助他消滅台灣意識。如果喬伊斯了解台灣，用他的偉大文學把「都柏林人」中的社會癱瘓、麻痺心靈等情境改寫成「台灣人」，豈不更貼切？

愛爾蘭的文化·產業

大衛·索羅斯比(David Throsby, 2007: 142-143)以「創意」為一個同心圓向外伸展的概念來定義文化產業，在這個產業模型的核心有：音樂、舞蹈、戲劇、文學作品、視覺藝術、手工藝品，也有新的型態如影像藝術、表演藝術、多媒體藝

術等。圍繞在同一核心的第二個群體包含：書刊、雜誌、出版業、廣播電視業、報業、電影業等「初級文化商品及相關服務」。第三個群體則是產品需要有點創意·文化內容的行業，包括廣告、建築設計業(工作需要創意)以及觀光業(因其部份市場區塊建立在文化基礎上)。

根據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United Nations World Tourism Organisation, UNWTO)的估計，全球旅遊人口(計算到達人次)於 2007 年達到了 9 億，相較於 2006 年增加了 6%的成長，亦即增加了 5 千 2 百萬的旅遊人口(*UNWTO Press Release*)。再根據愛爾蘭旅遊局的統計，2007 年有 9 百萬人至愛爾蘭島旅遊、探親或經商，這代表著 44 億歐元的收益。再根據該局的統計，以旅遊為目的的訪客中，有高達 54%的訪客來愛爾蘭島是為歷史或文化的探索(愛爾蘭共和國佔了 42%，北愛爾蘭佔了 12%)，有一半的旅客停留在都柏林。

當有高達一半以上的訪客來愛爾蘭島是為歷史或文化的探索，苦難的愛爾蘭人在愛爾蘭主體意識淪喪與建構的過程中，所擁有這些光榮的文化遺產，包括都柏林、三一學院、葉慈、喬伊斯等，無一不是愛爾蘭文化·產業的活水。三一學院的凱爾特之書，總是吸引旅人細細品味。葉慈故鄉斯立果(Sligo)的「葉慈紀念大樓」(Yeats Memorial Building)、「葉慈夏季學院」(Yeats Summer School)、「葉慈冬季學院」(Yeats Winter School)、「葉慈節」(Yeats Festival)等，每年有來自世界的愛詩人舉辦一系列的研討會、音樂會和劇場表演(吳祥輝，2007：232)。全球各地學術機構每年對喬伊斯作品的研究、論文發表、出版專書、研討會等，滿足了喬伊斯誇口「要讓全世界研究文學的批評家忙上 300 年」(莊坤良，2008：18)。

1954 年 10 月 7 日亨利希·伯爾(Heinrich Boll，生於德國柯隆，1972 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在它的《愛爾蘭之旅》的家書中寫著：「我的親親寶貝，這裡真美，妳們不在這裡，我真覺得難過。湖、山、雲和我從未見過、難以描述且不斷變化著的光線。……」(亨利希·伯爾：178)。除了山湖風光外，愛爾蘭的文化遺產，造就了大衛·索羅斯比(2007：164)眼中的「文化觀光業」，這是帶有特殊目

的的參訪，像是參加藝術節或造訪特定文化遺址，或是文化主題之旅，如以歌劇、文學等為題之旅。愛爾蘭文化滿足了文化產業所強調的各個層次，從產業模型核心的文學、劇作、舞蹈，到第二層次的出版、研討會等，進而成就第三層次的「文化觀光業」。不過，請別忘了，這些文學創作大都以英文完成，而非凱爾特語(Celtic)。當喬伊斯筆下的史蒂芬拒絕用一生的青春歲月來償還祖先遺留的債務時，或許，史蒂芬對於愛爾蘭的文化·產業竟是根源於愛爾蘭人以外語書寫的文學作品，更會感到矛盾。

結語

這篇論文嚐試連結愛爾蘭的文化意象與愛爾蘭主體意識。800 年的被殖民歷史壓抑了愛爾蘭的主體意識，卻也有文化遺跡紀錄著愛爾蘭的一切。文人、詩詞家在一波波的革命背後以文學作品建構愛爾蘭文化意象，並以期許、嘲諷方式連結愛爾蘭人與愛爾蘭主體意識。愛爾蘭文藝復興領航員約翰·歐李瑞(John O'Leary, 1830-1907)說「沒有國家，就沒有偉大的文學；沒有文學，就沒有偉大的國家」。愛爾蘭偉不偉大可能不是那麼重要，但他的文學成就豈止是偉大而已？當愛爾蘭的文學成就吸引了無數旅人以朝聖的心情造訪愛爾蘭，所成就的又豈止是愛爾蘭的文化·產業而已？愛爾蘭意識、愛爾蘭自尊在此同時被建構，引領著愛爾蘭人更加珍惜自己的國土。令人無法釋懷的是，喬伊斯筆下的史蒂芬如果繼續拒絕用一生的青春歲月來償還祖先遺留的債務，繼續放棄凱爾特語，而以英語建構愛爾蘭自己的文學創作，有朝一日，語言沒了，還有文學嗎？

參考資料

- 大衛·索羅斯比。2007。《文化經濟學》張維倫等譯。台北：典藏藝術家庭。
- 王振華、陳志瑞、李靖堃編等編著。2007。《愛爾蘭》。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向陽文化編譯部。2007。《愛爾蘭》。台北：遠足文化。
- 艾德娜·歐伯蓮(Edna O'Brien)。2006。《喬伊斯：永遠的都柏林人》陳榮彬譯。台北：左岸文化。
- 亨利希·伯爾。2008。《愛爾蘭之旅》劉興華譯。台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 吳祥輝。2007。《驚歎愛爾蘭》。台北：遠流。
- 邵毓娟。2008。〈來自帝國的福音或詛咒：探討一位年輕藝術家的畫像中個體與群體糾葛的文化難題〉收於莊坤良(編)《喬伊斯的都柏林：喬學研究在台灣》頁 51-74。台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 高維泓。2007。〈再見！喬伊斯：新時代的愛爾蘭小說〉《聯合文學雜誌》271 期。
(http://unitas.udngroup.com.tw/web_old/b/200705/Storyb3.htm) (2008/09/28)
- 莊坤良。2008。〈等待鳳凰：會議室裡的長春藤日中的愛爾蘭選舉政治與殖民霸權〉收於莊坤良(編)《喬伊斯的都柏林：喬學研究在台灣》頁 21-48。台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 莊坤良。1988。〈大自然的呼喚——讀葉慈的「茵湖島」〉《英語教學雜誌》第 12 卷第 4 期，頁 73-79。
(<http://tw.myblog.yahoo.com/kunliang2006/article?mid=268&prev=269&next=266&l=f&fid=52>) (2008/09/28)
- 莊坤良。2007。〈作家與革命份子的島嶼：愛爾蘭文學與國家想像〉《聯合文學雜誌》271 期。
(<http://tw.myblog.yahoo.com/kunliang2006/article?mid=143&prev=153&next=83&l=f&fid=6>)(2008/09/28)

湯瑪斯·佛里曼。2007。《世界是平的》楊振富、潘勛譯。台北：雅言文化。

楊牧。2005。《葉慈詩選》。台北：洪範。

Allison, Jonathan. Fall 2001. "W. B. Yeats, Space, and Cultural Nationalism". *ANQ*. Vol. 14 Issue 4, p.p. 55-68.

(<http://web.ebscohost.com/ehost/detail?vid=12&hid=104&sid=83c499d3-8193-4f7f-81be-f06f17ee8444%40sessionmgr103&bdata=JmFtcDtsYW5nPXpoLXR3JnNpdGU9ZWwhvc3QtbGl2ZQ%3d%3d#db=afh&AN=5358437>) (2008/09/28)

Haskell, Dennis Spring 2001. "W. B. YEATS". *Kenyon Review*. Vol. 23 Issue 2, p.p. 168-174.

(<http://web.ebscohost.com/ehost/delivery?vid=14&hid=104&sid=83c499d3-8193-4f7f-81be-f06f17ee8444%40sessionmgr103>) (2008/09/28)

James Connolly. (http://www.historylearningsite.co.uk/james_connolly.htm) (2008/09/28)

O'Toole, Fintan. April 1994. "Ireland's cultural revolution". *Europe*. Issue 335, p.p. 16-19.

(<http://web.ebscohost.com/ehost/detail?vid=6&hid=104&sid=83c499d3-8193-4f7f-81be-f06f17ee8444%40sessionmgr103&bdata=JmFtcDtsYW5nPXpoLXR3JnNpdGU9ZWwhvc3QtbGl2ZQ%3d%3d>) (2008/09/28)

The Economist. Oct 14th 2004. "The luck of the Irish".

Thomas Bartlett. *BBC British History: Empire and Sea Power. The 1798 Irish Rebellion*.

(http://www.bbc.co.uk/history/british/empire_seapower/irish_reb_01.shtml) (2008/09/28)

UNWTO Press Release. Jan. 29 2008. “World Tourism Exceeds Expectations in 2007
- Arrivals Grow From 800 Million to 900 Million in Two Years”.

(http://www.unwto.org/media/news/en/press_det.php?id=1665) (2008/09/28)

Wikipedia. “William Butler Yeats”.

(http://en.wikipedia.org/wiki/William_Butler_Yeats)(2008/09/28)

Wikipedia. “Trinity College, Dublin”.

(http://en.wikipedia.org/wiki/Trinity_College,_Dublin)(2008/09/28)

Wikipedia. “Edmund Burke”. (http://en.wikipedia.org/wiki/Edmund_Burke)

(2008/09/28)

Wikisource. “Patrick Pearse’ Letter to his Mother, 1 May, 1916”.

(http://en.wikisource.org/wiki/Patrick_Pearse%E2%80%99_Letter_to_his_Mother,_1_May,_1916)(2008/09/28)